

## 旧体诗入史： 学理重铸与现实动力

白浩<sup>①</sup>

对于旧体诗应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，从学术史的事实还原上来说，当然是该“入”，但是事实上在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反対意见是非常突出的。对此种意见我们应当慎重审视。该“入”，但是要慎“入”，不草率地“入”！尤其是在现在很多理论问题、学理问题没有展开充分讨论的情况下，还不能简单地“入”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这不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，并不是说我给它写出来了它就是符合历史公正的。正如常说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，史的写法代表了当代人对历史、现实进行阐释和整合的认识观，而重写文学史从来都不是简单和表面化的一个“编写”问题，它是一个学理导向的问题，也是涉及话语权斗争的问题，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双重意义的革命：一是思想变革，是由学理重塑而指导创作的新诗革命；二是权力变革，对于既定秩序的掌控者来说，这涉及一个利益控制与重新分配的格局变革。也正因此，历史上有“利不百，不变法；功不十，不易器”（《商君书·更法》）的说法。回顾以前，在20世纪80年代，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学术运动，就是重写文学史。之所以可称作“革命”，缘于它就是要推翻原来的那种意识形态一元独尊的控制权，所以加入了所谓的“民间话语”，加入

<sup>①</sup> 白浩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
了“知识分子话语”，文学史才把沈从文、张爱玲、钱锺书、周作人这些人“平反”。这个“平反”就是“革命”，就是颠覆和重构，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文学史都是“革命”的结果。而现在旧体诗入史的话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光是要看到这“一发”的问题，更要看到“全身”的问题。

在我看来，为什么形成现在不把旧体诗写进现代文学史这样一种格局呢？它有历史的合理性。如果说现在要入史的话，它动摇的就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学理根基。就现代文学的发生来说，它最初就是“新文学”。新文学是相对于旧文学而言的，是技术上的白话文运动，以白话取代文言，以自由诗取代旧体诗；就是思想上的反封建，以个人主义、个性解放来启蒙。换句话说，新文学学科的产生、现代文学学科的产生，就是旧体诗不但不能入史，而且要打倒、要打死的问题。所以，现在我们说要把它写入史，那就意味着，要颠覆——还不光是动摇——这个根基，颠覆这个母体。所以这也是目前现当代文学界的代表性的观点。这里面有出身论，即它出身就是打倒旧体诗的；也有就性质来说，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，而旧体诗已经从思想上、形式上不具有现代性了。当然今天周啸天老师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就是说旧体诗写作要翻出新意、新变，它不是简单的复活，如有人所说的那样“僵尸复活”。这关键就在于旧体诗的现代化转化问题，是沉渣泛起还是旧邦维新、翻出新变？周老师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我们要写出现代的思想话语。这里，我们可以借鉴王富仁先生所说的“新国学”思路，曾经“国故”与“新学”是处于对立和否定状态，但历史进化已经形成了新的学术共同体，仍然延续这种割裂和对立，会造成视野和思路的停滞，因此需要“新国学”来统率这个新的传统。旧体诗写作亦如此，它并非简单复古，而是正在发生的新文学书写中的一种，是“新文学”中的一员。这就是第一点，我们要从学理上来理顺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。

再者，这样一个学术变革的动力，其导向不光是一个历史的问题，它还有面对现实的诗歌发展道路的问题。“入史”话题的提出背景，表面上是基于学术公正而来的学术抗议，明明是中国人当下发生的文学，怎么就入不了史？而其本质则是针对现代以来的“西化”抗议，针对“西化”理论专制下的话语权垄断抗议，是曹顺庆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思路的进一步延伸和应用，是对于学术民族化、本土化资源重新引入的吁求。在文学史上，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其实有好几次，像20世纪

30年代的新月派，他们搞“诗歌三美”——建筑美、音乐美、绘画美就是要把旧体诗当中的养分吸入进来发展新诗。包括现当代文学内部的现代与当代分界之争的争论与变化，其实也是话语权争夺与学理导向的争夺问题。“当代”概念的发生就是要以延安文艺及其后的共和国文学一体化来推翻“五四”文艺的话语权，以民族化、本土化来取代西化路径。包括到了新民歌运动，毛泽东所说“用白话写诗，几十年来，迄无成功”<sup>①</sup>，也是看到了新诗的问题，然后要吸取本土化的力量。20世纪80年代的“二十世纪文学”的提出核心也在于重塑“五四”话语权，这也推动了其后文学发展的再度西化。实际上现在我们又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，就是说现在新诗出现了问题，旧体诗明显有复兴之势。为什么呢？重要的原因是新诗发展陷入了它的困境。我们现在看的新诗、自由诗大家普遍不太懂了，为什么读不懂呢？主要是新诗现在写得越来越“高级”，怎么“高级”呢？它主要是已经越来越走向义理化、玄学化那种论述，它已经摆脱了诗歌传统的叙事、抒情的路子，更多地进行荒诞、虚无等等那样一些义理的论述，这和宋诗后面的发展道路是有很多相似的、值得警惕和借鉴的地方。宋诗后面以理入诗，以禅入诗，甚至以理代诗，就窒息了其生命力。而现在新诗一方面存在形式过于自由散乱、缺诗魂，另一方面则在于脱离基本的生活土壤，过度理念化、过度个人化。21世纪以来，在小说领域对于纯文学的检讨，就是对于小说不讲故事、不塑造人物的一种反动，甚至底层文学对于现实主义的重新引入，除了现实生活的需求，也是一种文学发展自身的纠偏。而诗歌中知识分子写作的玄学化、民间写作的口语诗过于散乱化，都是无现实土壤与无魂的症状。所以我觉得，思考旧体诗的复兴，以及旧体诗是否写进文学史，我们应该充分地考虑到，其背后一方面是学术史的公正这样一个动力，另一个动力那就是新诗发展道路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究竟是不是在西化的路上一直走下去，应不应该重新引入民族化、本土化资源的这样一个良性发展的问题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旧体诗固然是有人写，具体成就大小姑且不论，但其阅读和传播范围很小则是肯定无疑的，因此，从创作者角度入史是恢复公正，可从文学接受传播史的角度来说，不入史也是另一种公正，由此产生一种观点——“就算入了史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也还是没多大

<sup>①</sup> 毛泽东：《毛泽东和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》，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：《文艺理论争鸣辑要》（上）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318页。

用”就值得重视。因此,对于旧体诗人史的问题,我们需要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理论抱负,那就是超越个体的公正问题,引入“新文学”“新传统”的学理重铸和新诗发展道路现实动力挖掘的双重驱动力。

其三,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,即操作层面的问题。对于国学、对于旧体诗,我们现在确实已经学养不足,甚至可以说基因断代、学养断代了。按理说这是我们现当代文学界都应该关注的问题,但是好多现当代文学的学者说,这个话题我们不感兴趣,这个话题我们没有研究过。现在就是叫我们现当代文学学者来编写这么一章,还真很难找人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真的要编写的话,那我们还得开学习班来补课,我们得来学、读、写,培养这样一种鉴赏能力才行。要写,也不是简单的现象罗列,而是建立在对于作品与学理融合,有清晰思路的新的文学观的基础上写,要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办。这也是我说的不能草率入史,应该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准备的原因。当然,这是一种期望,但现实的操作可能也有另一种路径,就是有人会说学理争论是“此亦一是非,彼亦一是非”,可能是无休止的、漫长的,我们可以先干起来、先写起来,甚至边写边争论。其实,这或许会是更有现实可能性的一种路径,正如市场经济、“姓社姓资”等问题的“不争论”而造成了某种发展事实一样,亦如国学与旧体诗词学养匮乏而导致今日的“知易行难”一样,理论与事实并驾齐驱是一种理想,而有先有后也是常态。